

云南文史

山川契阔 人境共生

——魏晋至隋唐云南生态环境探微

曹津永 马颖娜

爨氏分治下的低强度开发

魏晋三百余载，云南未臻一统，爨氏据地而治，部落星罗棋布，诸族杂处共生。这般的“各部守境自安”的政治格局，书写了人类活动的低强度特质，人地关系以“自然主导、人类适配”为主线，生态系统维系着原生的稳态，山河依旧保持着最本真的模样。

彼时云南的地理环境，尽显多元交融之态。《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葛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这段文字既勾勒出多民族杂居的社会图景，更暗合了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不同族群的分布与迁徙，皆与所处自然环境休戚相关。疆域之上，云南“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里”，广袤无垠。滇地作为一方地理标志，《华阳国志·南中志》详载其貌：“有泽水，周回二百余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这独特的人文特征，为坝区农业浇灌出天然福祉。气候方面，垂直分异特征尤为显著，《水经注》记“诸葛亮之平南中也……特有瘴气”，尽显湿热之态；《梁江文通文集》亦云“夜闻猩猩啼，朝见鼯鼠迹。南中气候暖，朱华凌白雪”，冷暖交织的气候风貌跃然纸上。自然资源更是丰饶，“贯古县，山出银、铅、铜、铁”，“博南县……有金沙，以火融之谓黄金”，矿产遍布；“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共仰之”，安宁盐井成为南中地区不可或缺的经济命脉。

农业开发呈现鲜明的地域分异，诸族因势利导，依地理禀赋演化出各异的生产范式。坝区之地，地势平坦，水源充沛，土壤肥沃，遂成定居农耕的核心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其“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蚕桑”，稻作农业已然成型，虽规模有限，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亦浅尝辄止，却为族群生存奠定了物质基础。山地地区则不然，“自樊道至朱提有水、步道……土地无稻田蚕桑，多蛇豕

虎狼”，自然条件的严苛，使得大规模农业开发难以推行。然而人口渐长之下，山地农业亦缓缓兴起，《蛮书·云南管内物产》所言“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或许正是魏晋时期山地开发传统的延续，虽未有燎原之势，却彰显了人类适应自然的智慧。

这一时期，人类活动始终处于自然的包容之下，开发强度舒缓，生态系统未遭剧烈扰动。部落分治的格局限制了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可能，而诸族“随境而居、顺时劳作”的生产生活方式，又与自然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关系。

南诏拓疆时期的人地关系

公元738年，南诏统一六诏，结束了长期分治的局面，政权的统一为大规模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改造强度陡增，却在扰动中开启了人地调适的初探。

农业开发率先掀起全域扩张的浪潮，从传统坝区向山地、边疆全面铺展。“南诏德化碑”记载其农业政策：“瘴寒流潦，高原为稳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徒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廩。”此番举措，尽显南诏改造自然、拓展耕地的决心，通过治理水患、疏浚陂池，让高原变良田、洼地成园林，实现了家国富足的愿景。坝区之上，先进农业技术得以推广，《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详载南诏稻作技术：“从曲靖州已南，滇池巴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叮嚀。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稻麦复种制的推行，极大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让坝区农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山地之间，梯田技术广泛应用，《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悉被城镇蚕将，差蛮官遍令监督催促”，田埂筑石、沟渠导流，既增加了耕地面积，又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尽显南诏先民改造自然的巧思。

矿产资源的开采亦规模日盛，成为南诏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南诏德化碑”有云：“西开寻传，禄鄯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丽水地区的金矿开采尤为兴盛，《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详细描述了淘金过程：“熬金。出丽水，盛沙淘取之。沙散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大规模的矿产开采，为南诏带来了丰厚财富，却也对局部生态环境造成了扰动，成为人地关系紧张的开始。南诏时期的云南，在开发与保护的博弈中前行。大规模的农业拓展与矿产开采，让这片土地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压力，但信仰与制度层面的生态保护举措，又为其赢得了喘息之机。人地之间的摩擦与调适，共同谱写了这一时期环境史的复杂篇章。

魏晋隋唐时期云南区域人与自然关系演化的深层肌理

遍历魏晋至隋唐的沧桑变迁，从魏晋的人与自然安和状态到南诏的开发调适，这一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空间格局、民族互动，共同勾勒出人地关系的核心样貌，为西南边疆环境变迁研究提供了重要密钥。

魏晋之世，爨氏“分治守境”的策略，使得各部落固守一方，缺乏大规模改造自然的政治动力与组织能力，人类活动多局限于自然条件优越的坝区，开发强度温和，对环境的改造不深，生态系统得以维系稳定。南诏立国后，驱动着开发向全域铺展，政权的统一提供了组织保障，技术的精进赋予了改造能力，农业、矿产、交通等领域的全面发展，让环境压力陡增。然过度开发引发的生态问题，又倒逼南诏政权探索可持续发展的之路，从文化信仰到制度建设，逐步构建生态保护机制，人地关系进入初步调适阶段。这种因政改策而衍生的环境变迁轨迹，揭示了政治因素在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演化中的核心驱动作用。

空间格局稳定，梯度开发绵延。魏

晋至隋唐时期，云南的坝区凭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天然优势，自始至终都是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从“椎耨耕田”的初步开发，至南诏时期稻麦复种制的广泛推行，坝区农业不断精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蛮书·云南管内物产》所言“从曲靖州已南，滇池巴西，土俗唯业水田”，便是坝区农业繁荣的生动写照。山地地区，受限于地形与气候，开发始终保持适度原则，魏晋时期零星兴起的山田耕作，到南诏时期发展为“殊为精好”的梯田技术，既满足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又通过科学的耕作方式减少对生态的破坏。边疆地区则多处于轻度开发状态，保留了大量原始生态风貌，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庇护所。这种梯度开发格局，既顺应了云南复杂的地理环境，又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其稳定性与合理性，使其得以跨越时空，延续至今。

云南各族群杂居的格局，在魏晋至隋唐时期与多元生产方式形成了紧密的关联，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习惯，对环境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最终促成了生态互补的良好局面。白蛮多聚居坝区，以定居农业为业，基本维持了秦汉时期以来“滇、濮之人，椎耨耕田，有邑聚”的生活状态。乌蛮则主要分布于山地，保持着“编发左衽，随畜迁徙”的游牧传统。此外，其他各族亦依自身所处环境，发展出渔猎、采集等多样生产方式。多元生产方式的并存，既满足了各族群的生存需求，又保障了整个区域的生态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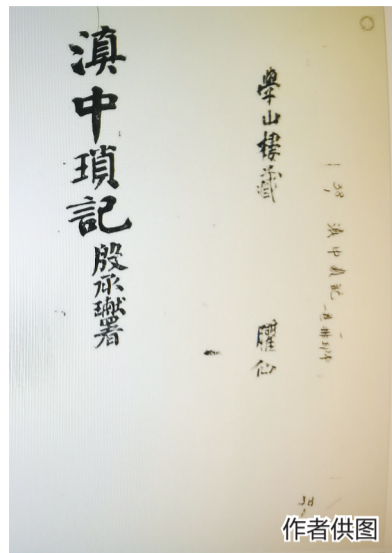
魏晋至隋唐之间，云南区域人地互动展现出以自然为主导，开发与调适并行的历史特征。从魏晋分治的生态安和到南诏拓疆的博弈共生，这段历史深刻印证了人地关系相互依存、动态影响的本质，为西南边疆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

【作者分别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

文载滇情 书藏旧忆

——读杨琼的《滇中琐记》

朱荣佳



作者供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遥望桑梓地，何人不起故园情。云南历史悠久、文化多元、物产丰饶，杨琼所著《滇中琐记》便承载着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此书以滇西大理为中心，融入作者亲身见闻，记录了云南的古今异事、风俗物产与地方掌故，内容琐碎而不碎、杂而有章，语言质朴平实，记事真切翔实，是探寻明清以来滇地风土人情的珍贵文献。该书自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动笔，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定稿，前后耗时三十余年，凡一百三十六篇。民国元年(1912年)李根源为其排印刊行，幸得保存。李根源、赵藩均为该书作序，倍加推重。赵藩赞杨琼“一心正，两眼明”，称其治学严谨，心怀赤诚。

杨琼(1846—1917年)，字叔玉，号迥楼，晚号柿坪夫子，云南邓川(今属洱源县)人，白族。他出身书香门第，国学根基深厚，年近花甲仍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躬身学校教育，晚年潜心著述，为延续多样文脉鞠躬尽瘁。其著述颇丰，而其中最接地气、最具乡土情味的，便是《滇中琐记》。

《滇中琐记》所载云南掌故与人物传记，大多可作为研究正史的补充材料。书中对杜文秀起义记载尤详，如《永昌回乱》《杜文秀之乱》《省垣变乱纪略》《平定杜乱》诸条，皆因杨琼友、兄亲历其中。《兴禄》《邵晋》《压盐致变》等条，则揭露晚清官场腐败。书末《云南存亡三大问题》一条，收录《续议滇疆界商务条款》《滇越铁路章程》《隆兴公司承办云南矿务章程》三个不平等条约，记列强蚕食滇边行径，足以警醒后世。书中所记人物庞杂，文臣武将、孝子烈女，皆可补史谈助。

此书最为引人入胜之处，莫过于对滇地奇特物产的描述。如《边地异草》一条，记冬虫夏草、断肠草等奇异草木，而景东酸枣尤为可怖：采者醉倒则使人酸死，采者疯癫则使人狂死，毒性发作与采者心境相应。读之不免倒吸凉气，其真实性有待科学检验，却极富哲理——这哪里是草，分明是人心险恶的映照。书中所记鱼类亦颇有趣味，《弓鱼》《金钱鱼》诸条记载详尽，“虽松江鲈脍，味殆不及也”，道尽弓鱼味道之绝。而最引人垂涎的，莫过于乳扇，《乳扇》一条记其煮沸、揉团、晾晒的完整工序，读之只觉乳香扑鼻。

书中不仅展现了异彩纷呈的自然风貌，所记云南人文风俗亦十分鲜明。既有令人谈之色变的“放歹”“蛊毒”，也有纳西人“溜筒江”的惊险，最具特色的，当属《瓦符》。书所记清代云南民间交易习俗——交易双方各执一物，一言为定，取瓦片敲为两半相视，一言为定，取瓦片敲为两半各执其一，日后各执为凭，借贷钱数用年号代指，如借十钱称“道光钱”，借百钱称“嘉庆钱”，古风淳朴中更见智慧。至于社会恶俗，杨琼则敢于秉笔直书，怒斥瘟疫逝者暴尸荒野、婚嫁重财家要厚聘等陋习，字字恳切。此外，书中所载大理特色节日更是热闹非凡，三月街商贸云集，绕山林会融祭祀、娱乐于一体；鹤庆松桂会尤以马匹交易为盛；中秋鱼潭会，家家户户扶老携幼，“赶热闹，玩品，具酒馔，会亲友”。

《滇中琐记》亦记录了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如《种树老人》记载耄耋老人吴联元种树之事，杨琼将其比之郭橐驼，此顺应天性的种树之道，是为政之道，亦是养心之道。《张万》记张万儿子举重金偿还赌债，让他亲历艰辛，明白钱财来之不易，此不言之教胜过千万训诫。《捕卒》记捕卒为蝇头小利充当盗贼耳目，是杨琼对盛世名者的讽刺。《冒名履任》《陈嫂》《捧月鸟雕》等故事皆寓意深远。然怪异事亦有，如《鬼婿》《柴翁》《石日神君》诸条，尚可供茶余饭后消遣。

总而言之，《滇中琐记》并非艰深晦涩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洋溢云南烟火气息的乡土札记，从中亦能看到一位晚清滇中老者的故土情怀与文人担当。翻阅此书，云南山川风物、民俗节庆、旧闻掌故如在眼前，无论欲品家乡历史，还是欲寻趣味旧事，此书都值得选来一读。

（作者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基地班学生）

南诏石刻：唐代边陲的交往丰碑

陈祥美 付钰

“南诏德化碑”位于大理太和城遗址内，为南诏第五代王阁罗凤于天宝战争后所立，碑文颂扬阁罗凤的文治武功，叙述南诏、唐朝与吐蕃三方关系及战争缘由，表明叛唐的不得已与和好愿望。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位于昭通盐津豆沙关，记载唐与南诏重归于好的史实。两块碑刻见证了唐与南诏从友好到决裂再到和好的跌宕历程，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见证。

错综复杂的唐与南诏关系

南诏原为洱海地区六诏之一。为击败吐蕃、经略洱海，唐朝扶持南诏统一六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南诏国正式建立。册封加强了中央对洱海地区的统治，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交往。

到了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年间，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残暴地对待南诏，导致天宝战争爆发，南诏和唐朝的决裂使得唐王

朝失去了在云南经营一百多年的成果。此后南诏转向吐蕃，公元752年，南诏被吐蕃册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兄弟之国)，给金印，号“东帝”。南诏于是改元为赞普钟元年，建立年号，成为独立于唐王朝影响之外的政权。这场使得唐朝损失惨重，近20万官兵“弃之而死，只轮不返”的战争不仅使唐朝在西南地区的控制力大为减弱，而且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祸根，更是改变了唐、南诏、吐蕃三方在西南地区的势力对比。

南诏德化碑——承载和好意愿

天宝战争结束后，南诏念及长期以来与中央的良好关系，对战死的唐军将士妥善安葬，“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阁罗凤认为天宝战争是因张虔陀等人的残暴压榨而起，但民族间的和平交往是人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南诏迟早要与唐王朝重归于好。为此他在太和城外树立了南诏德化碑，并在碑文中列举了张虔陀的“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蔽我”“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等罪状的同时，也在碑文中阐明了自己迫不得已作战的原因，表露出了希望与唐朝和好的愿望，“若(将来)唐使者志(至)，可指碑裸被(洗清)吾罪也”，这为唐诏重新建立新的友好关系埋下了伏笔。

南诏德化碑是一块标志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丰碑。其“德化”二字寓意着以德治国，以德化民的儒家治国理念。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南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极大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内涵。南诏德化碑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它对于

研究唐代云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和书法的杰出代表之一。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见证重归于好

公元779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继位。吐蕃将异牟寻由“赞普钟南国大诏”降封为“日东王”，从兄弟之属降为臣属，为唐诏和好创造了外部条件。在南诏清平官郑回与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共同努力下，双方于点苍山会盟。异牟寻接受唐朝册封，标志唐诏友好关系全面修复。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六月至七月，唐朝派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为南诏册封使“赐南诏异牟寻金印银案，文曰：贞元册南诏印”。《蛮书》记载，袁滋一行自石门入云南，作为书法家的袁滋，亲自题写了册封事由，刊刻在石门关的山崖上，历经风雨，其字至今犹存，成为南诏重新归属唐王朝的历史见证。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现位于昭通市盐津县，其内容是：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差遣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沿途，故刊石纪之。其中提到袁滋奉唐中央之命远赴南诏册封异牟寻，这不仅巩固了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的关系，在沿途“开路置驿”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双方沟通交流的地理距离，这也为打破闭塞的边疆状态，密切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袁滋册封南诏是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的一次重要事件，这次册封恢复并促进了中原王朝与西南边疆的交流。关系修复后的唐与南诏恢复了各领域的交流。如艺术领域，南诏在天宝战争之便和唐朝在音乐上曾有交流。阁罗凤之子凤伽异入唐宿卫，在归国时唐玄宗曾赐南诏胡部、龟兹乐二部并笛工、歌女。当袁滋册封后，贞元十六年南诏向唐朝进献“夷中歌曲”，称为“南诏奉圣乐”，并在长安宫廷中进行演出，《新唐书·礼乐志》用大量篇幅记载这次演出。南诏与唐朝这种歌舞技艺的交流甚至影响了中南半岛上一些国家，贞元十八年骠国也曾派歌舞队随南诏歌舞队一起入唐，在唐长安宫廷演出。唐德宗还封骠国乐队的

领队馆隗陀为太仆卿，这对中缅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此可以看出，由于天宝战争而一度陷入缓慢发展的交流在袁滋册封之后得以重新活跃起来。

民国时期，昭通金石学家张希鲁实地考察后认为，了解袁滋摩崖的学者很少，因云南地处边陲、豆沙关偏僻，但此石刻“关系国家开发边疆大事确凿可凭”，其价值无过于此。

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融具有重要意义

南诏在唐朝扶持下统一洱海，虽因人为原因短暂失和，但始终谋求与中央恢复关系。在韦皋、袁滋等人努力下，最终顺应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重新开启交流。唐与南诏的交往历史表明，中原各民族倾慕并接受中原文化，中原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也深刻影响了云南发展，成为云南与内地建立良好关系的内在原因。

以《南诏图传》为例，它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佛教连环画，画卷的款式、题记皆采用汉文。在韦皋、袁滋等人努力下，最终顺应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重新开启交流。唐与南诏的交往历史表明，中原各民族倾慕并接受中原文化，中原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也深刻影响了云南发展，成为云南与内地建立良好关系的内在原因。

南诏德化碑和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见证了唐朝与南诏之间的政治互动和民族交流，这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南诏德化碑和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对于促进民族交往、推动民族交流、增强民族交融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南诏德化碑 作者供图